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大革命

周 养 儒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大革命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所发动的第一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因而在中国掀起了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民解放斗争，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势力，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到了大革命的后期，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不顾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背叛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而我党当时还年幼，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一）我党革命统一战线方针的形成和共产党人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我们党成立后，为了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实现党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就必须组织革命队伍，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因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势力是异常强大的，中国无产阶级虽然有着坚强的战斗力，但人数少，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要想战胜强大的敌人，争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这就必须联合中

国各革命阶级和阶层。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而我党对革命统一战线的认识和统一战线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党的一大决议规定：我党“不准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这说明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尚未形成。党的一大后，经过我党中央的同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党员张太雷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到广西桂林会见了孙中山，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谈。此后，马林和张太雷又到广州，实地考察了国民党治理广东的情况，并同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进行了接触。马林由广州回到上海后，向我党中央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的合作。但我党大多数领导人反对马林这一建议。一九二二年七月，党的二大总结了党的一大后领导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革命理论，在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的同时，明确提出要和国民党合作，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当时的设想是先邀请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等民主派召开代表会议共同协商，然后在全国各个城市召集各革命群众团体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同国民党采取党外合作的形式。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根据早年在爪哇从事革命工作的经验（他在爪哇从事革命活动时，曾促成印尼共产党的前身社会民主联盟，在保持组织上独立的前提下，加入资产阶级性质的伊斯兰教联盟，以实现革命统一战线）和他多次同孙中山接触了解到的孙中山的意愿，仍然建议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他的这一意见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成。

一九二二年八月，根据马林的建议，中共中央在西湖召开了特别会议。会上，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的建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和经马林的解释与说服工作，最后，多数中央委员从尊重共产国际指示出发，接受了加

入国民党的主张。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会后，我党领导人会晤孙中山，提出我党关于两党合作的主张，并向他建议依照民主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孙中山欣然表示同意，从而开始了孙中山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当时国民党内的冯自由、居正、邹鲁等极力反对国共合作，反对按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孙中山高瞻远瞩，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顺应历史的潮流，在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的支持下，坚决主张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他曾当面对反对改组国民党的人说：“你们怕共产党，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见何香凝：《我的回忆》）孙中山排除各种阻力，决心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一九二二年九月上旬，孙中山在上海召开讨论国民党改组的会议，指定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九人组成的党章起草委员会，成立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党务改进计划起草委员会，一九二三年元旦，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一月下旬，孙中山发布国民党本部干部人选，陈独秀被推为参议，林伯渠为中央总务部副部长，张太雷为中央宣传部干事。一月二十六日，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签订了《孙文与越飞联合宣言》，正式确定了联俄政策。

共产党人除在组织上帮助国民党改组外，还通过各种方式，善意地批评国民党所持的错误观点，从政治思想上促进国民党革命化。当时，共产党人在《向导》等刊物上，就曾善意地批评了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和联合一部分军阀反对另一部分军阀的错误；批评了他忽视宣传和组织民众的错误；批评他企图用裁兵的办法来缓和军阀之间矛盾的错误。这些与人为善的批评，无疑对促成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我党西湖会议后，虽然党中央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

等相继加入国民党，但党内大多数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仍然持怀疑的态度。为了推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早日建立，共产国际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是必要的。还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76页）共产国际这一决议和我党领导的震撼全国的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失败，这使党内许多同志对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中心的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张国焘等人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和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加入国民党会削弱共产党的力量，会混淆工人阶级的思想。这正如周恩来后来所指出的：张国焘“他不了解广大工农群众参加进去，可以改造国民党，争取领导权”。（《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59页）大会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人的“左”的错误，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民主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并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把优秀的国民党党员吸收到我们党里来。

党的三大确定的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因为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辛亥革命后仍然继续坚持民主革命的立场，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革

革命力量。同时，也因为孙中山等从过去失败中吸取教训，开始改变原来的思想，欢迎十月革命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帮助，表示愿意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主张依照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可以进一步壮大革命力量。而且因为国民党在组织上极为松懈，共产党员加入进去，可以帮助孙中山把国民党改造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更便于从内部来影响国民党的政策，推动和联合国民党左派，打击和制裁国民党右派，推动国民党革命化。同时，也因为国民党有广东根据地，在许多地方有合法和半合法的地位，共产党员加入进去，可以利用这一条件，来发动和组织工农群众，发动革命运动，推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展。

党的三大虽然存在着对中国工人阶级力量 and 作用估计不足和对国民党估计过高的缺点，认为中国劳动阶级还处在极幼稚的时代，认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的领袖。但是党的三大确定的国共合作的方针在我党历史上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符合当时中国实际情况，符合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全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国共两党的利益。党的三大正确地解决了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方针和形式问题，把党的二大提出的民主联合战线的原则向前推进了一步，统一了全党对国共合作的认识，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党的三大后，我党更加积极推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九月，共产党人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国民组织。十月初，苏俄政府应孙中山的邀请，派鲍罗廷到广州。鲍罗廷到广州后，于十月间，同中共中央、青年团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以及中共广东区委的负责同志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帮助国民党改组问题，还在广东成立“国民运动委员

会”，以推动正在进行的改组工作。十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改组国民党特别会议，制定实行改组的计划，并决定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的政治顾问。随后，孙中山指派共产党人谭平山和廖仲恺等九人组成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办理国民党改组工作。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三届一中全会。会议明确指出：在凡是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共产党人都要加入进去；中国共产党应努力“站在国民党的中心地位”，在全国各地扩大国民党组织；帮助改变国民党的错误的政治观点，以国民党的名义去建立各种革命群众组织。会后，我党中央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发出了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提出在选举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时，争取每省至少有一个共产党员当选，并努力帮助国民党中激进分子当选。与此同时，共产党人积极帮助国民党制定国民党组织法和党章草案，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为国民党一大的召开作必要的准备。

（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在我党的帮助下，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参加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帮助起草的《宣言》，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重新解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我们知道，旧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对外没有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对内则还存在着大汉族主义的错误观点。而在《宣言》中重新解释过的民族主义，则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主张。旧三民主义中的

民权主义，只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口号，根本没有彻底推翻封建制度的主张和依靠工农的政策。而《宣言》中的民权主义，则提出“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页）；指出民权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明确规定“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同上，第7页）。旧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只有一个空洞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口号。而《宣言》中的民生主义，则规定“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同上，第7页）。大会还确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结合起来。这就使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这种具有反帝反封建内容和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共同的革命纲领。大会选举了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共产党人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这样，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正如刘少奇同志曾经指出的，过去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死气沉沉的，“同共产党一合作，国民党就生气勃勃，就有了新的生命力了”；“他跟共产党合作，开了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办法就有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也有了，政治、军事、群众运动都有了办法”（刘少奇《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在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见《党史研究》1980年第3期）。国民党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从而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二、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下，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指引下，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迅速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第一次大革命。

（一）建立了一支革命武装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摆在国共两党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建立一支革命军队。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为建立革命武装创造了条件。为了培养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军事干部，作为建立革命武装的骨干力量，一九二四年五月，孙中山在我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军校是国共合作的成果，是国共两党共同努力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人对军校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周恩来等一批共产党人不仅参与军校的领导，而且在军校建立了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制度。军校强调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并重，注意在学生中进行反帝反封建和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军校成为区别以往旧式的军校，而成为一所革命的新型的军官学校。军校培养了大批的军事和政治工作人才，为建立革命军队提供了干部力量。它开创的政治工作，为革命军队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共产党人不仅帮助创办了军校，而且帮助建立和改造了革命军队。统一战线建立后，当时广东政府所辖的有滇、桂、湘、赣、川、粤等军队，基本上还都是旧的军队，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在官兵关系和群众关系上同旧军阀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些军队在一九二五

年八月以后，陆续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各军中采取了党代表制，并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我们党为改造这些军队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共产党人周恩来、林伯渠、李富春、朱克靖、罗汉、黄日葵、彭泽湘等曾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各军的政治部主任以外，还有一大批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从事政治工作。正是由于他们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灌输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才使这些军队得到改造，开始成为具有明确政治目标和民主精神的军队。另外，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在周恩来主持下，还建立了我党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这是一支有高度政治觉悟，良好纪律和坚强战斗力的革命军队。

在我党帮助下，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创办的黄埔军校和在对旧军队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支革命军队，对于统一广东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二）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国共合作后，当时广东境内的反动势力是很大的，广东政府处在岌岌可危之中。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除派遣军舰对广东直接武装侵犯以外，还支持广东地主买办势力、混在广东政府内部的反动军官和国民党右派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支援盘踞在广东东部和南部的反动军阀，不断地向广州进攻。为了扫除广东的反革命势力，巩固和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左派一起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军事斗争方面，广东政府在我党的推动和帮助下，在工农群众大力支援下，于一九二四年十月平定了英国支持下的广东买办资产阶级新组织的反动武装组织——广州商团的叛乱；一九二五年二月，在我党的推动下，广东政府举行了讨伐当时对革命政权

威胁最大、占据广东惠州、潮州和汕头一带的军阀陈炯明，予以沉重的打击；一九二五年六月，镇压了滇、桂军阀杨希闵和刘震寰发动的武装叛变；一九二五年十月，又进行了第二次东征，在省港罢工工人和东江各地农民积极支持下，迅速歼灭了陈炯明的主力，占领了广东东江地区；接着又进行了南征，消灭了盘踞广东南部的军阀邓本殷的反动军队。歼灭了盘踞广东境内的反动军阀部队。在政治斗争方面，于一九二五年七月改组了大元帅制的军政府，成立了委员制的国民政府，撤掉了右派胡汉民代理大元帅的职务，并联合国民党左派相继以各种名义把右派分子胡汉民、许崇智和邹鲁等人送出广东。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党推动广东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建设和统一财政的政策，使广东政府的财政收入逐年有所增加。经过统一广东的革命战争和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一系列的统一措施，广东革命根据地才得到了统一和巩固，从而为北伐战争准备了一个后方基地。

（三）发动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广大的工农运动

国共合作建立后，我们党加强了对工农运动的领导。一九二四年五月，我党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批评了“二七”大罢工后不注意发展工农群众运动的错误，对恢复和发展工农运动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主张。同时，也由于统一战线的建立，我党可以通过国民党的名义，利用国民党在一些地方的合法和半合法的地位，以及共产党人担任从国民党中央到各级地方党部一些领导职务这一有利条件，从而使“二七”大罢工后处于低落状态的工人运动和广东的农民运动，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初步发展。到一九二五年五月初，在我们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有一百六十多个，拥有有组织的工人五十

多万，并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东，有二十多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参加农协的会员达二十多万。

从一九二五年五月开始，在我党领导下，上海工人、学生反对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特别是反对英帝国主义血腥镇压举行反帝示威游行的上海学生和其他各界群众所制造的“五卅”惨案的斗争，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反帝革命大风暴——五卅运动。在我党领导下，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先后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和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全国各地约有一千二百万革命群众，不顾帝国主义军阀的残酷镇压，参加了这一反帝爱国斗争。其中最著名的是省港大罢工，参加这次大罢工的广州沙面租界和香港的工人有二十万。五卅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提高了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的觉悟，工人阶级的组织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五卅运动的影响下，全国农民运动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广东和湖南两省广大农民向地主、土豪劣绅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农民协会组织日益壮大，而且湖北、河南、广西、江西、河北、江苏、安徽、山东和陕西等省也相继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运动逐渐兴起。在广东政府的支持下，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广州主办了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共培养了八百多学员。他们分赴全国各地，有力地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一九二六年秋开始，工农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我党领导下，工农运动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的千百万农民向不法地主和土豪劣绅展开猛烈的攻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农村大革命。他们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解除地主的武装，建立农民的武装，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把几千年来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

落花流水，使农会实际上成为乡村唯一的权力机关。农民组织也得到迅速的发展，一九二七年初，全国有组织的农民发展到近千万，较之一九二六年五月初的近百万人，增加了十倍。在我党领导下，上海工人阶级在继一九二六年十月和一九二七年二月举行两次武装起义之后，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又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解放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一九二七年一月，汉口、九江工人及其他革命群众收回了两地的英租界。在斗争中，工人阶级的组织迅速扩大。据统计，一九二四年底全国有组织的工人为二十七万，到一九二七年六月发展到六百万，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增加了二十多倍。

（四）取得了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

中国革命的发展，到一九二六年初，准备北伐战争的任务提到国共两党的议事日程。为了准备北伐战争，实现人民群众希望早日北伐的愿望，一九二六年二月，我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确定我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提出北伐战争的政治纲领“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必须加强北伐战争必将经过的湖南、湖北和河南等地的群众工作，特别要注意发动农民群众。会后，我党一方面积极推动和帮助广东政府进行北伐战争的军事和物资的准备，另一方面大力组织和发动工农群众，为北伐战争造成牢固的群众基础。

在我党的推动下，广东国民政府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开始北伐战争。北伐战争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革命统一战线，进行的一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北伐战争打击的对象是占据中国广大地区的北洋军阀，即直系军阀吴佩孚、奉系军阀张作霖和新直系军阀孙传芳。其目标是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解放

了长沙、武汉、南昌、九江、福州、杭州、南京、安庆等大城市。把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歼灭了帝国主义支持下的数十万军阀武装，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北伐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春的革命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进行的，是贯彻了我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政治主张，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追随无产阶级的，因此，取得了伟大胜利。但由于我们党当时还年幼，缺乏经验，虽然总的来看是实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但在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许多问题上并没有彻底解决，因而无产阶级实现领导的程度还是不充分的。特别是在政权和武装方面，我们还只是实现了一般的政治领导，许多实权还在资产阶级手里。在国民党这个统一战线组织中的领导权，只掌握了一部分，而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逐渐被资产阶级所篡夺，这就给正在蓬勃发展的大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机。

三、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和逐步提高的过程。

（一）党的四大以前我党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

我们知道，党的二大虽然提出无产阶级发展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但在论述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时，却多次提出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帮助”、“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这表明它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是不明

确的。党的三大，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不但没有在党的二大基础上前进，相反，有所后退。它提出中国国民党“应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党的三大后，我党中央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开始有了初步认识。如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我党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就曾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这一重要思想。而党的一些领导人发表的文章中则较为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应当领导民主革命的问题。如，瞿秋白在一九二三年六月，曾指出“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革命领袖的地位。”（见《新青年之新宣言》，《新青年》季刊，第一期）又如，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邓中夏在《我们的力量》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然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中国工人》第二期，1924年11月）但是应该看到，在党的四大前，虽然我党中央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开始有了初步认识，党的一些领导人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但从总的来看，我们党和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对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还不是很明确的。

（二）党的四大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一九二五年一月，我们党在上海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5页）同时，还提出工农联盟对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要领导革命取得成功，必须发动农民起来斗争，否则，中国革命不可能成功，工人阶级也不可能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四大”提出的

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我党过去历次大会所没有提出的,这表明我们党在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这不仅在理论上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以后我党在实际斗争中在一定程度上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也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大会对于资产阶级要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则估计不足。会议曾错误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尚处在发展的过程中,因而也就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性。

(三) 党的新民主主义基本思想的初步形成

四大以后,由于在五卅运动中各阶级都作了充分表演,广东、湖南等省农民运动的兴起,革命统一战线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加剧,这为我党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提供了重要条件。

从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二六年初,我们党和党的许多领导人先后发表文章,总结五卅运动经验,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又有重大的发展。例如,一九二五年五月邓中夏在《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指出:

“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里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中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所以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中国工人》第5期,第53页,1925年5月)又如,周恩来在一九二五年六月发表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及其他文章中指出:“军队的组织有很大的意义,是实现我们的理论的先锋”(周恩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1925年6月2日,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1926年印发的《政治工作须知》);军队是一种工具,“压迫阶级可以利用,

被压迫阶级也可以利用拿来造成他本身的武力”（同上）；“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工人不仅要努力工人运动，而且要努力跑入军队里去做军士运动”（周恩来《在省港界罢工工人代表第六次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见《工人之路》特号第三期，1925年7月）。再如，我党一九二五年十月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提出党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把实行“耕地农有”列入自己的政治纲领；并提出党的任务是要“平民武装夺取政权”和“力争国内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同年十二月，李大钊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也指出：实行“耕地农有”是“广大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35页），并且认为，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广大工农阶级的力量去完成。这些认识，很显然比党的四大前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其他文章中，集中了党内正确意见，把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初步解决了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和革命前途问题。其主要的特点是：明确提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必须区分敌友，注意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进行了更加深入、具体和细致的分析，指出中国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但很“集中”，“特别能战斗”，“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把资产阶级明确区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精辟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